



· 厉以宁经济著作系列 · (北大版)

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

lyining jiushiniandaiwenxuan

北京大学出版社

厉以宁经济著作系列（北大版）

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

经济漫谈录

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

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与秦宛顺合著）

怎样组建股份制与股份合作制企业

（修订本，与曹凤歧、张国有合著）

中国宏观经济的实证分析（主编）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ISBN 7-301-03789-9

I. 厉… II. 厉… III. ① 厉以宁-文集 ② 企业经济-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当代-文集 IV. F279.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2562 号

书 名: 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

著作责任者: 厉以宁

责任编辑: 彭松建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789-9/F·273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排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室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32 开本 11 印张 280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一版 199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

北京大学出版社

非均衡条件下经济增长与波动的若干理论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导论

本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经济增长理论与数学模型”的最终研究成果。该项目的主持人是北京大学厉以宁、秦宛顺和靳云汇教授,即本书的三位主编。本书共分为三篇:上篇为中国经济增长分析,中篇为中国经济波动分析,下篇为中国经济周期分析。

在本书的“导论”中,准备就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下列若干理论问题进行论述,以说明本课题研究的经济理论依据。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是:

- 一、经济的非均衡对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制约
- 二、两类非均衡的区分与经济增长、经济波动的分析
- 三、对非均衡理论中的“短线决定原则”的理解
- 四、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与流通之间的关系

五、关于正常波动与非正常波动的思考

一、经济的非均衡对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制约

经济非均衡理论从本世纪 60 年代后期起有较大的发展。克劳威尔(Robert Wayne Clower)于 1965 年发表的《凯恩斯派反革命:理论上的再评价》(载于哈恩与布雷克林编《利率理论》1965 年伦敦版)和 1967 年发表的《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的再考虑》(载于《西方经济学杂志》1967 年 6 月)两篇重要论文中,就非均衡理论提出了一个与经济增长、经济波动有关的值得注意的论点,这就是:经济的不稳定并非来源于某一市场本身,而来源于包括各个市场之间的不协调;至于各个市场之间的不协调的存在,则又应当从各个市场的不完善性和信息传递机制的不健全方面来寻找原因。如果把这种非均衡分析方法运用于经济增长与波动分析的领域内,那么显而易见,不仅以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和已形成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为前提的均衡增长公式将失去作用,而且以有效需求受到收入及其变动的限制作为经济体系内在不稳定的主要因素的经济波动假设也将被看成是具有很局限性的。

紧接着,莱荣霍夫德(Axel Leijonhufvud)出版了《论凯恩斯派经济学和凯恩斯的经济学》(1968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版)一书和其它一些作品。他同克劳威尔一样,也以非均衡的分析方法来重新解释凯恩斯经济理论,并就经济稳定与不稳定

的原因作了如下的分析。他认为,经济生活中,以劳动的供给为一端,以商品的销售为另一端,这两端之间有若干中间环节,如雇主雇佣工人,雇工生产商品,雇主付给雇工工资,雇工用工资购买商品,雇主使商品销出等等。但由于价格刚性的存在,市场的不完善,信息的不通畅,传导机制的缺陷等原因,上述各个中间环节中只要有一处未能衔接,这个经济的链条就会中断,经济的不稳定也就难以避免。这正是经济非均衡的一种表现。如果把这种非均衡分析方法运用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分析领域内,那样同样可以证实经济增长不可能按均衡增长论者所设想的那种均衡增长途径进行,经济波动也不是遵照国民收入均衡公式所要求的调节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平衡关系的做法就能克服的。

70年代以来,贝纳西(Jean-Pascal Benassy)和科尔内(Janos Kornai)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非均衡理论作了深入的探讨。贝纳西的《市场非均衡经济学》(1982年纽约版)、《宏观经济学与非均衡理论》(1984年巴黎版)、《宏观经济学:非瓦尔拉分析方法导论》(1986年纽约版)等书,以及科尔内的《反均衡》(1971年阿姆斯特丹版)、《短缺经济学》(1980年阿姆斯特丹版)、《增长、短缺与效率》(1982年牛津版)等书,都在非均衡分析方面有不少突破。他们关于宏观经济运行的研究对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贝纳西在非均衡理论分析中的主要贡献是在对于非均衡条件下的限制因素的分析方面以及数量配额的效应分析方面。按照贝纳西的观点,在价格不灵活时,交易者既要根据市场的价格信号来调整需求量和供给量,又要根据市场的数量

信号来调整需求量和供给量,于是交易者受到双重限制,即价格限制和数量限制。数量限制的具体形式就是不同形式的数量配额,也就是:在供给小于需求时,如何把有限的供给分配给需求者们,而在供给大于需求时,如何把有限的需求分配给供给者们。通过数量配额而实现的均衡,称为配额均衡。它是一种非均衡,又是一种特定意义下的、暂时的、事后的均衡。这种均衡的位置是由供给或需求的短线(短边)决定的。贝纳西认为,在考察非均衡经济时,不仅应当摒弃均衡假设中关于价格灵活性的前提,而且必须引入价格刚性与价格伸缩的不对称性。价格刚性与价格伸缩的不对称性固然有某种联系,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的效应则是有区别的。价格伸缩的不对称性使非均衡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更为复杂,政策的作用也更加受到限制。如果再引入预期概念,即交易者对非均衡条件下的不规则的经济行为的个人预期,那么非均衡的经济更不易趋于稳定。

科尔内的非均衡理论分析另有特色。他着重考察的是抑制性通货膨胀条件下的经济非均衡,也就是以短缺作为特征的经济非均衡。这时,有限的商品供给通过数量配额而给予需求各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增加财政支出,那么商品市场上的需求会进一步扩大,有限的商品供给的分配会更加紧张、更加困难,抑制性的通货膨胀也会更加严重。反之,如果试图用紧缩财政支出的手段来减少商品市场上的需求,那么在需求减少的同时,供给量也将减少,其结果仍然没有解决供给缺口问题。科尔内在研究非均衡经济时,把企业的预算硬约束与软约束作为讨论的重点之一。他的这些观点是很有价值

的,因为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将使经济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也就是使经济中的短缺现象难以消除。

从国外经济学界对于非均衡经济的研究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波动,都必然受到经济的非均衡的制约。

在以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甚至新剑桥模型为代表的流行于 50—60 年代的经济增长论中,经济均衡论的影响是很深的。这种影响不仅反映于哈罗德—多马模型和新古典模型内,而且也反映于新剑桥模型内。新剑桥模型与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的一个重大的区别,是在模型中引入了两类不同的收入以及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这当然应当被承认为新剑桥模型的贡献。然而,即使是新剑桥模型,也没有摆脱市场完善、价格灵活、信息传递通畅等公开的或暗含的假设;新剑桥模型所反映的经济增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主要来自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而不是主要来自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各个不同市场之间的不协调。这样,新剑桥模型依然解释不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供求缺口的持续存在对于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新剑桥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如琼·罗宾逊等人,从经济理论上说,是反对经济均衡假设的。他们从凯恩斯的著作中找到了经济非均衡的论点,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不同意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的论点。但为什么在经济增长分析中却未能摆脱经济均衡论的影响呢?原因在于他们的微观经济理论是不足的、有弱点的,他们忽略了市场交易行为的分析、企业运行机制的分析、信息传递机制的分

析。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增长模型的内在缺陷。

在经济波动的研究中,流行于 50—60 年代的经济波动论以 IS-LM 分析(投资·储蓄—流动偏好·货币供给分析)、乘数—加速原理分析为代表的学说,是以经济均衡假设和经济的均衡增长假设为前提的。根据这些分析,如果说经济中产生波动的话,那么这只是由于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投资偏多或储蓄偏多,货币供给过多或货币供给过少,以及技术设备更新的自身规律所致,而与市场机制的缺陷、价格的不灵活、信息传递的不通畅等等没有直接的关系。再说,IS-LM 分析还忽略了宏观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的分析,乘数—加速原理分析则偏重于经济中的技术性因素的考察,它们同样不考虑宏观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这也就决定了这些流行于 50—60 年代的经济波动论的严重不足。

60 年代后期起关于经济的非均衡理论分析的进展,对于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研究有重要的启示。经济的非均衡性质对于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制约作用,经过非均衡理论的研究者的探讨,已经日益被学术界与经济界所承认。这些探讨并不是一概否定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新剑桥模型在经济增长理论研究领域内的意义及其在某些方面的可借鉴性,也并不是一概否定 IS-LM 分析、乘数—加速原理在经济波动理论研究领域内的意义及其在某些方面的可借鉴性。这些探讨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从而使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分析具有一个新的、与现实状况联系更紧的立足点,它们所得出的某些结论,比流行于 50—60 年代的有关理论分析较为符合实际。

经济非均衡分析在经济增长与波动方面所得出的主要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1. 如果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信息传递不通畅，那么投资与储蓄之间的转化将受到阻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一旦出现，就不易消失。市场只可能使供给缺口或需求缺口有所缩小，但这些缺口仍将继续存在。于是将出现非零失业率条件下的均衡或非零通货膨胀率条件下的均衡，这就制约了经济增长或导致经济的较大波动。

2. 经济的非均衡使得不同市场(商品市场、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等)之间的协调更为困难。一旦一个市场出现了供给缺口或需求缺口，不仅这个市场上的缺口难以消除，而且必将引起其它市场上的缺口的产生与扩大。这种情况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或成为经济较大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3. 经济的非均衡以价格刚性的存在作为特征。价格刚性对于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表现于交易者根据经济生活中的假象来制定供给与需求的决策，但价格刚性并不一定意味着价格永远不变，而很可能意味着价格的突然地、较大幅度地变动，而且是不对称地变动。这对于经济增长固然不利，更重要的是，这可能引发较大的经济波动或使波动加剧。

4. 经济的非均衡以及非零失业率与非零通货膨胀率条件下均衡的存在，必将改变市场交易双方的预期。预期的不稳定或预期的紊乱，将导致经济行为的不规则，导致经济行为的短期化。这不仅是加剧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也是阻碍经济稳定增长与持续增长的有力因素。

二、两类非均衡的区分与经济增长、经济波动的分析

按照非均衡理论的分析,并且结合我国的实际经济情况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对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以及经济增长的途径有较深入的认识。

要知道,既然经济的非均衡状态来自市场的不完善、价格的不灵活、信息传递的不通畅等等,那么按照这样的逻辑,从理论上必定得出下列两个论断中的一个:

甲、由于经济的非均衡来自市场的不完善、价格的不灵活、信息传递的不通畅,因此,要使非均衡条件下的经济避免较大的波动,使经济有比较稳定的增长率,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首先要实现的是放开对价格的限制和完善市场,使经济生活中的交易各方都处于平等竞争的位置上。经济增长将在市场完善和价格放开的环境中实现。

乙、由于经济的非均衡来自市场的不完善、价格的不灵活、信息传递的不通畅,这些都反映了市场机制的局限性,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加强宏观经济管理,以政府的数量配额与价格调节来弥补市场机制之不足,纠正市场不完善所造成的经济中的偏差。在经济增长方面,为了维持较稳定的经济,政府的数量配额(包括资金配额、劳动力配额、生产资料配额等)将起着主要的作用。这就是说,非均衡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应当是以政府的数量配额为主的经济增

长。

以上所指出的甲、乙两种论断,都来自对经济的非均衡分析。论断甲是经济改革中的“价格改革主线论”的简要表述,论断乙是经济改革中的“宏观调控主线论”的简要表述。就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分析而言,按照论断甲的说法,非均衡条件下的经济波动主要归因于市场不完善和价格不灵活,避免经济波动的主要改革措施或维持经济较稳定增长的主要改革措施就必然是放开价格和完善市场;按照论断乙的说法,非均衡条件下的经济波动主要归因于市场不完善或市场机制本身的局限性,避免经济波动的主要改革措施或维持经济较稳定增长的主要改革措施就必然是加强宏观经济管理,把政府的数量配额和价格调节放在主要地位。

然而,对我国的实际经济情况进行研究后却发现,无论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按照“价格改革主线论”的主张去做,还是按照“宏观调控主线论”的主张去做,都不可能顺利地推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可能避免我国经济的较大波动或维持我国经济的较稳定的增长。换言之,“价格改革主线论”或“宏观调控主线论”都是不符合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的。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要知道,经济改革中的“价格改革主线论”与“宏观调控主线论”都来自对经济的非均衡分析,既然这两种论点都不妥当,那么将会引起人们的进一步思考:究竟是非均衡理论错了呢?还是一般的非均衡理论分析不够完善,从而解释不了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与波动这样复杂的问题呢?

非均衡理论相对于均衡理论而言,确实是经济理论的一

种进展。经济均衡的假设依存于市场完善、价格灵活、信息畅通等前提。如果不具备这样一些前提,那么经济均衡的假设就不能成立,而现实经济必定是非均衡的经济,从而只能运用非均衡分析方法来进行分析。可见,我们不能由于“价格改革主线论”与“宏观调控主线论”不适合我国当前的经济现实而认为非均衡分析是错误的。问题不在于非均衡分析本身。

那么,问题究竟何在?问题在于一般的非均衡理论分析不够完善,以至于解释不了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与波动这样复杂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一般的非均衡理论分析并未把微观经济单位(企业)是否具有充分活力考虑在内,而是暗含了这样一个假定,即企业作为微观经济单位已经具有充分活力,因此,经济非均衡现象主要来自市场的不完善、价格的不灵活、信息传递的不通畅等。正因为如此,所以由此推出的结论或者是以价格改革为经济改革的主线,或者是以加强宏观经济管理为经济改革的主线。这就是一般的非均衡理论分析的不完善之处。厉以宁在《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0 年版)一书中,就这一问题提出了如下的看法:经济的非均衡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经济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第二类经济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和企业缺乏活力条件下的非均衡;现阶段的中国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当相应地分为两个阶段,即应当以深化企业改革为主线,使企业从缺乏活力转为具有充分活力,从不自愿经营和不自愿盈亏转为自愿经营和自愿盈亏,以便使中国经济由第二类非均衡状态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状态,然

后,以完善市场和放开价格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以便使中国经济由第一类非均衡状态逐渐向均衡状态靠拢。对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以及针对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特征进行研究,就是厉以宁所著《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的基本论点,也是厉以宁在非均衡分析中不同于一般的非均衡理论分析的地方。

区分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对于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波动是有意义的。经济增长在第二类非均衡条件下所受到的制约,要比在第一类非均衡条件下多得多;导致经济波动的因素在第二类非均衡条件下也要比在第一类非均衡条件下多得多。同样的道理,与在第一类非均衡条件下的情形相比,在第二类非均衡条件下,维持经济的较稳定增长或避免经济出现较大的波动要困难得多。如果我们不了解第二类非均衡状态与第一类非均衡状态的区别,只把市场的不完善、价格的不灵活、信息传递的不通畅看成是对于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看成是引起经济有较大波动的基本原因,从而根据这些判断来选择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对策或制定防止、消除经济较大波动的对策,那么很可能不得要领,以至于选择的对策收不到应有的成效。正如医生在给病人治疗时,如果对病情的诊断有错误,对病因判断错了,那么就会开出不恰当的处方,不但医不好病,反会延误病情。

假定不区分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不了解当前的中国经济正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而是把完善市场和放开价格作为维持经济稳定增长与防止经济较大波动的主要对策,或者把加强宏观经济管理作为这样的对策,那就忽略了企业作

为投资主体和消费基金发放主体的不自主经营、不自负盈亏对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最有力的制约作用。在第二类非均衡条件下,企业还没有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企业的投资主体、消费基金发放主体的地位,或者是虚的,或者不受约束,其结果,必然造成以下的问题:

1. 企业想投资,但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自主权,投资意愿未能实现,从而经济增长难以与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同步。

2. 企业不具有投资的自我约束机制,也不承担投资风险、生产经营风险,以至于在投资增长过程中,重复建设难以避免,规模效益无法实现,从而经济增长的过程可能同时就是库存产成品积压数量增长的过程、企业亏损额扩大的过程。

3. 企业的行为是短期化的,消费基金的发放是为了企业眼前利益,企业的经济增长后劲遭到破坏,设备老化、技术陈旧,经济增长将因此受到限制。

4. 企业缺乏内在约束机制,消费基金的发放可以不受本企业经济效益的限制,或者,工资奖金虽然同企业经济效益挂钩,但企业经济效益却是掺了水的、虚假的,这样,工资奖金越是同企业经济效益“挂钩”(也就是不合理的挂钩),企业的实际损失就越大,国家因此遭受的实际损失也越大,这不能不限制了经济增长。

5. 企业在投资方面的缺乏自我约束以及在消费基金发放方面的缺乏自我约束,对宏观经济的消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之一是导致投资膨胀与消费基金增长过快,这时,即使经济增长率可能高一些,但经济增长却是依靠投资膨胀与消费基金增长过快支撑的,这样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持久,而且

很可能为此后的经济巨大震荡种下了根源。消极影响之二是企业的亏损面增加和财政收支紧张,而财政收支的紧张又成为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巨大障碍。

6. 企业的不自负盈亏,特别是政企不分的事实,使得企业的关、停、并、转十分困难,企业资产存量的流动缺乏途径,生产要素也无法在社会范围内优化组合。其结果,产业结构的调整迟迟不能顺利进行,“瓶颈”现象也迟迟不能消除。这样就制约了持续的经济增长。

7. 在企业不自主经营、不自负盈亏的条件下,不仅企业资产存量难以流动,从而通过企业资产存量的流动来调整产业结构的意图不易实现,而且通过投资增量来调整产业结构的意图也是很难实现的。投资增量是有限的,有限的投资增量是不容易扭转整个产业结构失调的局面的。但问题不限于此。问题在于:企业资产存量好比一潭死水,投资增量好比活水,今年的投资增量一投入企业后,就转化为来年的企业资产存量,这就等于不断地把活水变为死水,活水再多也无济于事。其结果,“瓶颈”依然存在,经济增长依然受到巨大的限制。

8. 在第二类非均衡条件下,由于作为微观经济单位的企业往往同政府部门没有分开,在政府采取宏观经济调节手段时,企业或者难以通过调整自己的经济活动来适应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或者因缺乏自我约束机制而对宏观经济调节手段作出不适当的反应,于是宏观经济调节手段收不到应有的效果。诸如投资缺乏利息弹性、进出口缺乏汇率弹性、产量缺乏价格弹性等等,就是宏观经济调节手段效果差的反映。这